

## 走过青春



● 新春快乐



● 吉庆有余



● 鸟语花香



● 玉兔呈祥

作者系北京知青王俊林

## 难忘村中那次扁食

王佚

1970年,是我在延安甘泉插队度过的第二个冬天。那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加上春节前,好多插队的同学都打道回京探亲过年,全大队就剩下我一个北京知青了,我更觉得有点寂寞和冷清。而且分给我的白面早已经吃光,只剩下玉米面和高粱米了。

一天,我上午在羊圈起肥,下午在草料棚铡草。收了工,我赶紧去井边担水,准备胡乱煮点吃食。

“瓷猴子(陕北大娘总是这样称呼我们男知青),担下水了就来窑里吃扁食(饺子)。”就在这时候,支书李志华的母亲向我喊道。

“哎!”听了她的话,我笑着作了回答。加快脚步往回担水。心里却十分矛盾。

我知道大娘是真的招呼我,那时候的陕北,人们非常贫穷,扁食这东西不是天天都有的吃的,大多数农村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几顿。想到这里,我决定还是自己做玉米面饼和高粱米饭吃。于是就开准备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支书的婆姨起来,拽着我往她家走。

到了她家,她把我让到了热炕头上,给我端上一大碗扁食。由于我好长时间没打牙祭了,看到这扁食就胃口大开。而且扁食馅是陕北特有的酸菜豆腐和羊肉大葱两种。当时我正当年,这碗扁食也没扛住细嚼慢咽就进了我的肚子。

吃完后,我忙道谢,然后站起来就要走。大娘让她儿媳又给我盛上来一碗扁食,说要让我

吃饱。还给我端上来一大碗烧豆腐。辣椒红红的,豆腐白白的,真是天下第一等美味佳肴。

“不用了,我已经吃饱了。”我忙推说。

“瓷猴子,你是嫌不好吃,还是怕我上北京城找你爸去要个饭的钱?”大娘轻轻敲着我的脑壳。

这时候,支书李志华也回来了。他看到我的到来,就更加热情地招呼我。他又取出米酒,给我和他各倒了满满一小碗,让我跟他一起边吃边喝边聊……

这一幕已经过去50多年。后来,我也走过许多山山水水,也吃过许多山珍海味,可许多细节都已经记不清了。唯有在村子里吃的这顿扁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 磨面

鲍月兰

就像《水浒传》中的李逵,将桌子使劲儿一拍,大声喊道。

还有一次,他们又遇上了这种情况,就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用玉米换回一车西瓜。晚上,每个人都喜滋滋地抱着分得的西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还挺爽。

如果磨面那天,队长给了你一头骡子还好,麦子最多半天就能磨完。若给你一头驴,那可惨了!一天都磨不完。磨玉米还好,只三遍;磨麦子可就麻烦了,要磨九遍后才是麸子。前三遍出的面粉都是上好的富强粉,第四、五、六、七遍出的是白面,第八、九遍出的是黑面。记得那天轮到我和沈蕴惠磨面,偏偏队里给了我们一头驴。尽管我俩努力去争取也没用,那骡子给了大队长家了。

于是,我们只好用围巾将驴的眼睛蒙上,开始磨面了。

记得那磨盘上每次最多能放下大葫芦瓢的八勺麦子。待麦子下去一点后,我们再继续添加。当时,我们一个人负责用竹簸箕

收回磨下来的面,再用筛子筛,剩余的麸皮和面粉倒在一边。就这样要反复进行九遍。另一个人负责不停地将麦子放到磨盘上,还要赶着那头被蒙上眼睛的驴转圈儿。我那天干的就是转圈儿的生活。

老话说,懒驴上磨屎尿多。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呢!驴天性懒惰,抽一抽走一走,不抽它不走,还不停地用铲子清道。过去我胆子小,小猫往我身上爬,我都害怕。可现在,一只毛驴站在我跟前,我竟然一点儿都不怕,还敢不停地抽打它。

天渐渐黑了下来,夜幕笼罩了小磨坊。没有电灯,我俩只得停止操作。唉!天下的农民真苦啊!

那天,我俩整整磨了一天。我跟着毛驴,围着磨盘也转了有上千次,转得我头昏眼花。沈蕴惠也一直在喊累。

待我俩疲惫不堪地走出磨坊,回到村里时,全队的女同胞都笑得前仰后合。不知原因的我俩对镜一照,哈,我俩成了雪人儿。

## 当年驮水故事多

王小雷

“来到了黄土高原上,生活是多‘欢乐’。要吃饭,困难多,上山岗,下山坡,还要用驴儿驮;要吃饭,困难多,上山岗,下山坡,还要用驴儿驮……”

这是1969年,在宜川寿峰公社插队的我们这帮北京知青用波兰歌曲《在密林里》的曲调,填上即兴发挥的歌词后传唱的一首歌曲。它生动再现了我们当年赶着驮着木桶的毛驴上山岗、下山坡奔向河边的情景。

1969年1月18日,我们六个同学来到寿峰公社王家河村,住进了一孔窑洞。

我们村位于山腰,没有水井。取水要赶着牲口沿着山路到山脚的白水川驮水,往返约三四里路。驮水还要用到一个木质驮架,驮架两端由一根铁梁连接固定。铁梁上有两根端头带挂钩的铁链,用于拴挂一边一个带盖的、装五十斤水的木桶。取水时将桶放入河中灌满,而后将桶挂在驮架上。

我们进村时,窑洞里的水缸满满的。可几天后,驮水的问题就上了日程。于是,在队长的带领下,我们赶着毛驴到了白水川边。

驴头对着山,驴屁股冲着河。一人拽缰绳,驮架两边各站一人,各负责装一桶水。

河上的冰层被先来驮水的乡亲凿了洞。洞口虽又结了层薄冰,但在木桶的作用力下,冰已四散开来。随着桶盖上的圆孔咕嘟咕嘟地

冒泡,一桶水很快就装满了。

我两手抓住桶梁,用力将桶从水中提至岸边。别看就几秒钟的时间,刺痛的感觉已从双手传导开来。

“快放桶啊!”扶着另一侧驮架的同学催促着。

好在毛驴个儿矮,我把桶举过腰部即可放上驮架。可当我抓起铁链准备挂钩子时,手几乎粘在了铁链上……

就这样,我完成了取水的任务。接下来的工作是:双手托住驮架,防止因偏重而倾斜。

“快放桶啊!”我也开始了催促。

双手插在袖筒里,闻着驴屁、踩着驴粪,我们回到了村里。

三个人才驮回两桶水,确实太笨了。于是,我们省去了拉缰绳的程序(反正驴不会跑),改为两人。后来,看到乡亲们都是一人一驴去驮水,只有半大小子是两人一驴去驮水,脸上挺无光。

“人家一个人,咱也一个人!”我们也开始一人一驴驮水了。

一个人驮水的难题,在于保持驮架的平衡。最理想的操作是将两桶放在驮架两侧,人面对驴屁股,一手抓一桶。在将两只桶放上驮架的同时抓住铁链,挂好铁钩。

必须承认,能够如此操作的人实在不多,

我们几个北京娃没一个能行。

队长毕竟是队长。他教了我们两招:一招是把缰绳穿过驮架后拴在驴前腿上,这样在驮架单侧承重时就不会侧翻。再一招是将两桶放在驮架两侧,人面对驴屁股,一手抓桶,一手压驮架,将桶放上驮架的同时抓住铁链、挂好铁钩,而后托住驮架。待另一只手将桶挂好后,吆喝牲口走人。

第一招确实比较省力,但那是婆姨在男人外出、非得自己取水时才使的招数。咱虽岁数不大(当时还不满16岁),但毕竟是个爷们儿,不行。

于是,采用第二招。好在装五十斤水的桶不算太重,一咬牙也就上去了。

就这样,取水的问题解决了。

可是,到了7月24日,16岁的“老革命”又遇到了“新问题”。

请看当天日记节选部分:

“慰问的人们光临了,我们是笑脸相迎,发了一纸‘慰问信’。奇怪的是,我的肚子疼了起来,并且头也晕了……”

“驮水时又遇见老贫农家的村字一号特桶(注:装80斤水),沉重之极!水架之高,达本人颈部。本人奋力为之,努力奋斗达六次之多!放上后,我的头顿时晕了,伏于架上喘息一阵,方才缓过来。”

## 代课

## ——延安插队日记

夏广忠

1971年12月,我被公社从村里抽调出来,要去北边一个偏远的叫查科的村子开展整团工作。

之前,在公社召开的预备会上,说定还有邻村一位叫来福的青年与我同行。但临到动身的前一天下午,村里忽然有人给我带话,说来福一早替他爸去沟里放羊,为驱赶吃羊的狼,把腿摔伤了,去不成了。事已至此,我只能一个人去查科村了。

第二天早晨,我挎上书包,背着捆好的被褥,手里握着一根结实的青杠木棍就出发了。为了抄近路,我先向北走到靳家园,再沿着村边的沟畔西行,去寻找向北下沟的道口。

此时,雪已经下得很厚。脚下没有路,也见不着行人,只有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踏雪的声音。那时候总听村里的乡亲们说,沟里有狼,偶尔也有豹子出没。但我仗着年轻,手里又有根硬实的棍子,就什么也不怕。

找到向北下沟的道口后,我一口气翻越了两道沟壑。当我立身塬上,看到不远处的查科村时,已近中午。

进村后,村党支部王书记接待了我。在他家简单吃了午饭后,他把我领到村办小学中的梁老师住的土窑洞里,然后对我说:“梁老师是外村的,你俩就搭伴住吧!”

“好啊!”听了王书记的话,梁老师也高兴地说。并主动上前和我握手。

在查科村开展整团工作期间,我按照公社的要求,既参加村党支部召开的社员大会,宣传学大寨,号召大家深翻土地,还鼓励大家多养猪、多积肥,改良土地增产增收。更把主要精力放在配合村团支部组织团员学习青年工作的先进经验上,并完成好村团支部的换届改选工作和在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新团员工作。那时我想,这是我插队生涯中第一次独自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展整团工作,我一定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一定要努力完成任务。

就在我在查科村开展整团工作接近尾声的一天下午,梁老师跟我说,快过年了,他要回家帮助婆姨安排过年的事,让我帮他代两天课,还说他已经跟自己的学生们讲了这件事。我自然应了他。

隔日一早,我送梁老师出门。看到他像我一样手里拄着根棍子,肩上扛着村里的半口袋麦子,在辅雪的路上走着。我目送着他,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

查科村的小学校坐落在我与梁老师住所不远处的沟坡上。它是在沟的半坡处掘出的一孔土窑洞,简单用泥抹平了门面。窑内的墙上挂着木质的黑板,黑板前是一张极简单的桌

子。学生上课时用的桌子、坐的椅子也是东拼西凑,并不统一。窑洞前窄小的操场上,没有体育器材,甚至连一棵树的影子都没有。

课堂上,我按照梁老师交代的方法和内容进行讲课。各个年级的小学生一起上课。我给其中一个年级的学生讲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复习上堂课内容,或写我布置的作业,以此类推。

临近年底,黄土高原已经很冷。窑洞里没有取暖的炉子,有的学生手里捧着装有炭火的小瓦罐,并互相传递着暖手。全班同学知道我是北京知青,也都认真听我讲课,或者按要求安静地写作业。

课间休息时,大家高兴地围着我,听我讲半夜鸡叫的故事,讲阿凡提的故事,讲北京天安门的故事。记得有一位姓焦的小女孩问我:“我长大了能去北京吗?”我说:“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你当然可以去呀!”她听了我的回答后,“咯咯”地笑着。那笑声,至今仿佛还在我耳畔回响。

日月如梭,我在查科村开展整团工作及代课的事,一晃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梁老师还健在吗?那个姓焦的小女孩来北京了吗?在建设新农村的方针指引下,查科村里的小学校如果还有,也一定大变样了吧!